

论郑观应的民本思想

姜朝晖

(德州学院历史系, 山东德州 253023)

[摘要] 郑观应的民本思想体系包括:政治上以君民交泰公利说给君民关系定位,提出了通达民情的现实问题,以西方的议院选举和日报充实和发展民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张以近代科技教育取代科举制,以增进民众的智慧,并主张重整儒家伦理道德秩序对抗外来文化侵略;通过对郑氏民本思想的梳理,可以反映出近代民本思想的时代特点及内在局限性。

[关键词] 郑观应;民本;议院

[中图分类号] K8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05)05-0058-05

近代中国是一个思想高峰迭起的时代,围绕着救亡图存、民族自强这一主题,经世思潮、洋务思潮、改良思潮、变法思潮、民主革命思潮等等都曾形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既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又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晚清的政治。相比较而言,近代民本思想似乎不如前面几种思潮的声势那么大,其实,仔细考证晚清思想史,特别是在戊戌变法以前,有相当一部分先进的知识份子或官僚士大夫从骨子里说还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忠实信徒,只是随着民主思想的勃兴,民本主义这种带有封建君权色彩的民众观逐渐被民主论取而代之,从而淡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但是研究近代思想史决不应该忽视民本思想的客观存在,因为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治家治国安邦、应对社会危机的古老药方之一,它的理论直指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存在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如何在国家政治运作中给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合理的定位,从而缓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对立紧张的关系,封建社会形态下当然主要指的协调君民关系。民本思想的答案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其作用在于提醒统治者要清醒认识民众的力量,摆正民众的在国家中的地位,及时调整统治政策,重民意,通下情,使尖锐对立的君民关系保持必要的润滑,从而维护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进入近代,清王朝明显出现颓势,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但各种社会矛盾主要还是聚焦在封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和对立这一基本政治问题上。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振兴自强,社会的进步改良都离不开清政府如何收拢民心、团结民众的问题,离不开民众对清政府的信任、信心问题。所以,如何促使清政府振奋自强,发挥一个政府应有的团结民心凝聚民力的作用,救亡图存,实现国

富民强的目标,成为当时清醒的中国人都回避不了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近代之初的有识之士都本能地青睐和借助于传统民本思想,希望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挖掘出解决社会危机的答案,从而开始了近代民本思想的再兴。应当看到传统民本思想体系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有继承,也有相当大的调整 and 发展的,无论传统民本论是不是象现代新儒家所判定的那样就是民主思想,我们也不应该将近代民本思想简单地以封建落后思想判定之,它是与近代经世思潮、洋务思潮、改良思潮等时代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近代民主思想的早期输入完全是嫁接在传统民本论基础之上,从而使得民本思想自身也因此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改造,形成了古今杂糅、中西并存的近代民本思想体系,但它还是在与西方民主思想的争夺中败下阵来,这对后人的启发是很大的。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社会思想中包涵有深厚的民本主义关怀,他的民本观最能体现近代民本思想的复杂性,所以本文拟对郑观应的民本思想作以考证论述,期望能从中反映近代民本思想的一些面貌。

一、通下情

传统民本论者往往是从阐述立君之道为起点,审视和反思君主专制政治之弊端,来阐明君主对民众应有的态度的。郑观应的《原君》篇重申了传统民本论对君民关系的定位——立君为民说:“圣人之君人也,勤民至矣。”在传统中国,圣人、圣王就是一切文明制度的最终最高的解释,圣人勤民论就为立君为民说在逻辑原点上提供了历史依据:“善夫!太史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

[收稿日期] 2005-06-13

[作者简介] 姜朝晖(1968—),女,山东德州人,德州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这是对立君为民说的现实理性支持。总之他认为君主是为人民而立的，为君者应努力寻求与民众利益的一致，“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不利于君。”据此他对后世之君民关系的演变，对极端的君权专制都提出批评，他说后世君主传贤之局变为世袭，以举国为一人之私产，亿万百姓为奴隶，上下之情疏离，“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降及嬴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惟所欲为。呜呼酷矣！”^{[2] (P107)}他认为这种局面背离了上古立君之道，“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他还批评了宋儒“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顺受无贰”的观念是迂腐荒谬的，他质问道“信如斯也，则是天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2] (P108)}但是他将造成这种君民背离局面的原因总结为“推原其故，良由名分太尊，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事也。”^{[2] (P107)}即将君民对立的原因归咎于森严的等级名分日久天长，习惯成自然和君主对自己职责的忽视和健忘，这就未免有点将严肃的政治问题轻描淡写，对专制政治的批判太过肤浅和无力了。

在他看来君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君之有民，犹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如果君对民之疾苦漠不关心，则民亦不爱其君，社稷存亡也全然不顾了，“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以为兵戎兴败，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主之者有天意。”若要改变上下离心的局面使君民交相爱，则“非君民交泰不可。欲期交泰，非上下一心不可；欲求一心，非君民公利不可。”如何做到交泰、一心、公利呢？其责任在于君主能端正君心，明确为君的职责，树立为天下服务的信念。“使为君者，勿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曰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他指出为天下役是为天下主的基础，“故知君人者，坎然视己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2] (P109)}总之通过对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反思，郑观应确立了对君民关系的基本定位——君民交泰、君民公利、君为天下役，显然这些言论都是旧民本论的理论范畴。

有了对君民关系的基本定位做标尺，郑观应裁量现实政治得出了症结所在：“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上下离心。”^{[2] (P112)}他谆谆告诫当权者“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2] (P95)}所以如何使君民上下通情，如何沟通民意成为郑观应重民论的中心论题。围绕着通下情这个专制政治下的老问题，郑提出了开议院、兴选举、办日报等难能可贵的新主张，为实践他的重民思想开辟了新路径。

首先，他认为要“得众”“见情”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那么在他看来议院是个什么机构，起什么作用呢？“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2] (P95)}“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

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在他看来议院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达民情，使下无怨民，上无昏君，其最终结果是有助于维护王朝永固。而且他批评了当时的中国人对西学认识的肤浅，往往只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以为列强以此雄视宇内，其实，西方致治之本在于设议院以和民心，使朝野上下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如英国只不过一个蕞尔三岛的小国，土地人口不足中国数省，但“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原因就在于“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所以郑得出结论中国“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2] (P96)}而且他认为议院议政并不对清朝一元化的君权构成威胁，从而打消清政府的顾虑，他说“或谓恐失君权。不知君主之国，如英、德议院，所议之事与君不合者，可置不行。”^{[2] (P112)}不仅不威胁君权，而且可防止危害君权的事情发生，“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2] (P111)}总之，在他看来议院一开，会使君民上下一心，起着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和抵御外辱的积极作用，议院与皇帝一人宰制天下的制度并不矛盾，只会发挥改良君主政治的作用。

围绕着沟通民情，效法西方选举制，改革选官制度又是郑观应重民论的一大主张。他是从回顾汉代乡举里选制的崇实开始论及近代科举选官之虚伪，进而主张引进西方选举制的。他说乡举里选“盖使士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科举专尚时文，较之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贤良孝悌之选相差甚远。特别是近代所选之官只知剥削百姓贻害地方，“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改革的办法虽然很多，但他认为有安无危，有利无害，可大可久而不可废的好办法“其惟公举之一法乎！”他说的公举之法是指泰西的选举制，虽然名义上他说“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2] (P103)}实际上他恢复古制的意思很少，论述的主要内容都是在介绍西方选举制。除了一般地介绍西方议员选举的程序办法外，他着重宣传的西方选举的优点在于，一曰从众，议员真的来自民间，代表了民意。“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二曰民众对议员行为监督之严。“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三曰放宽选举人的资格限制。“顾其例偏重于举之之人，则尤为有理。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然后能各供所知；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然后能杜绝虚声也。”一句话西方选举制能从制度上保证真正反映民意，能通达民隐，也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能选举出真正的贤才。郑观应还对比和区分了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台谏御史制度与西方议员选举制，他指出台谏御史受君上操纵，即是君主专制的附庸，又是植党营私的渊藪；而议员来自民间，既能选出真正的贤才，又能真正代表民意。“爵禄赐诸君上，则不能不顾私恩；品第出于高门，则不能悉通民隐。而籍贯不可分，素行不可考，智愚贤否不能一律，则植私营党，沽名罔利之弊生焉。何若议院官绅均匀，普遍举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

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2] (P97)}。他还列举了清代的保举人才一途与议员选举制的差距，一保举人才的大员自己器识、才猷是否出色。二识人之难，“仅以言貌取才者，不失之伪，则失之诬。”^{[2] (P104)}三德才兼备之士未必肯干谒当道，富贵人难识其面。四奇才异能之士，督抚不能定其学问深浅。五督抚大员平日所识无非门生故吏姻亲等庸俗之人，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责而已。”保举一途“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耳”^{[2] (P105)}总之，通过古今中外选官制度的对比分析，郑观应可以说是较深入地阐释了西方选举制的优越性，对西方选举制的认识至少在制度形式上可以说是有比较准确的把握，这对引导重民思想向近代方向转变是很重要的。

除了议院、选举之外，西方的日报盛行，使民众智识高涨也给了郑观应很深的启迪，倡导广开日报成为他通达民情的又一重要渠道。他说中国古代自有一套通达民情的制度“古之时谤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后世又有言官谏官制度和清议风潮，“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2] (P114)}他认为日报乃是民众公意的自由表达渠道，“为公是公非之所系、众好众恶之所彰。”^{[2] (P116)}日报一行，可以通民隐、达民情、愜民心、伸民志。具体说来其益处在于：增进民众智慧、监督政府行政和益于国计民生，而他看重的主要在于前两项。他介绍了西方日报一行，议员之行为优劣、政事之动向、乃至器物、工艺、商务等情形都会不胫而走，“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2] (P117)}其结果是暴君污吏再也不能蒙蔽民众，日报“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俾蒙蔽欺饰之习一洗而空。是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2] (P113)}正因为看到日报与集权政治的矛盾冲突，所以郑反复告诫清政府要禁止地方官无端为难报社，无端封禁报社。即使报界犯禁也应该照西律轻罚。“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2] (P118)}西方日报主要是非官方的、属于民间社会自主的舆论喉舌，而在中国这个传统的政治权利操纵一切的社会中，政治体制之外的民意疏通渠道一直受压抑，郑虽然对日报行于中国的根本障碍分析不透彻，但其倡导作用仍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重民情民意是传统民本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传统民本论者对极端专制君权压制民众的批判虽不可谓不深刻，但对于如何从制度上保证表达民意、反映民意的畅通，保证听取民意、顺应民意的实现还没有有效的办法。重道义批判、轻制度建设是传统民本思想在政治方面的特点和弱点。郑把政治上的重民意识集中在通民情这个问题上，他借助西方的议院制、选举制和日报的形式来补充传统民本政治在重民意方面的不足，其尝试是非常有益的。

二、教民论

传统民本思想非常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突出道德教育的社会作用，主张以德治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即用封建的三纲五常培养国民道德、规范民众的社会行为、化导社会风俗，但也有强调君主自身道德修养，强调君主应仁

民爱物，抨击昏君暴政的一面。这种传统教民论对制约专制政治制度下的极端暴力统治的出现，塑造一代德治盛世也是有一定贡献的。近代郑观应的教民论则一方面继承了道德教育的传统，以重整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另一方面又突出强调发展近代科技文化知识的教育的重要性，以教育作为开启民众智慧、提高国民的志识、改善民众生活状况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从总体上来说郑观应并不否定传统伦理道德，而且非常重视以儒家礼教化育民众、塑造民众心理、改良社会风俗的作用，借以收拾涣散的民心，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在这一点上郑观应突显了他局限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保守性。但他没有象当时许多守旧派那样盲目地绝对化地坚守旧道德，而是历史地分析传统道德文化的内涵，批评封建政府的愚民政策是背离了古法，并且他将教化民众的问题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突出了一种维护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他盛赞中国上古礼乐教化制度，“古者悬书读法，以士礼乡饮酒化天下于尊亲礼让之间。”但他批评后代当政者只知愚民以逞一己之私，致使古代伦理教化之义沦落。国家不以实心实政教养民众，引导社会风俗，而只一味地以虚伪的制度或说教愚弄和蒙蔽民众，其结果往往是有害于国。首先，民众不闻教化，没有了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易于走上犯上作乱的道路，“生长乡闾不闻教化，耳目所蔽，习与性成矣。户口蕃衍，俯仰无资，饥寒所驱，铤而走险矣。”他认为粤捻之乱发生就是清政府“有民而不能自教”的结果。其次，他还认为中华道德文化的衰落必然使外来文化或其他异端邪说有机可乘，外来文化的侵略使中国有亡国的危险。他说“法兰西之君臣专以传教亡人之国，阴谋诡计，四海皆知。既已诱致南交，取越南如反掌矣！中国之户口四万万而终不自教，听外人取而教之，恐祸患之乘，更有非意料所及者。”^{[2] (P223)}所以他呼吁整顿基层的宣讲之法，宣讲的内容仍然“以圣谕要言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旁通曲畅”。^{[2] (P224)}借此重建传统伦理道德秩序。可以看出，郑观应认同传统伦理道德，希望重建封建伦理秩序，包含有深切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和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坚定的自信心，他希图借助传统文化的重建收拢民心、实现民族自强自立。他坚信“彼佛、老浮游之论，天方天主荒唐牵强之辞，何足与我中土之圣道王言互相比拟？果得认真经理，他日太阳首出，燭火皆消；洪钟一鸣，万声皆寂。万姓既改恶从善，永无犯上作乱之萌，万邦亦一道同风，咸知学圣尊王之义”^{[2] (P225)}

另一方面，郑观应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阐述了“教养之道”的应有之义，集中批判了专制君主愚民弱民的文化教育政策，将传统的教化民众观发展成为以科技文化教育来开启民众智慧的近代教育观。

首先从教养之道的历史起源上来说，文教之盛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是人类文明开化的标志，教养民众、开启智慧是国家、君主天赋的职责。他说上古智者圣者出，授民“精巧之法”“觅食之具”，教民“稼穡畜牧之事”“开物成务”草创人伦政治之美，才使民众脱离了饮血茹毛的禽兽状

态,所以“夫天生民以教养,托之于君,故有家国天下者,其责无过于教养。”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后世以愚民弱民为目的、造成人材不出、文化凋敝的文化教育制度。他说三代之后为君者人各自私,使教养之道的本初意义荡然无存,甚至形成了“暴秦崛起,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的文化状态。他揭露了后世之君锢蔽天下人智慧,以逞一己之私欲的阴暗心态,“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愚民教育的结果势必是中华文明的凋敝,“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2] (P221)}

其次,从近代的社会现实上来说,中外国家的兴衰对比已更鲜明地反映了教养之道,特别是科技文化教育开启民众智慧对国家民族兴衰、于人民生活好坏的直接影响。其一,教育能开启智慧、培养人材、振兴经济,是关乎国家兴亡的事业。“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他举例说欧美诸邦痒序学校遍布全国,人民无论贵贱皆得教育,“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而且“人材众则百事兴”,机器制造日新月异,农政商务兴盛,“士有教而民有养”,此即教养有道,使欧美诸邦勃然隆盛的状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印度、安南等国“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繁法严刑、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上下相蒙;农工废业、百姓流离。“此其教养失道,国势陵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中国的情况与之类似,“我中国教养之道,自三代以后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方今时事日非,国势益促,外有强邻环视,内有伏莽堪虞。”须“力为图治,亟行教养”。其二,教养之道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状况,兴格致之学,即发展近代科技文化教育,乃是当今人满为患的世界必然的、行之有效的养民之方。他指出专靠游猎耕牧已然解决不了今日社会的物质需要,格致之学能参悟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甚至驾御自然,有以一人养万人的功效,势必大行于世。他指出了人类由游猎而耕牧,再到兴格致之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说“夫以上古游猎之时,耕牧之世,犹尚教养,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弋猎固无以为粮,而耕牧犹虞不给,教养讵可废乎?”“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他认为格致之学是以人类智慧来改造自然,改善民众物质生活的有力工具,“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之元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能明其理,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于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他最终的结论明确提出了教育文化制度的近代化改革,“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开诚布公,与民更始。”^{[2] (P222)}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郑观应的主体文化取向是守旧的,没有脱离儒家的伦理纲常,但其教民论指明的方向却趋

新。他的文化教育思想以培养民众智慧、解决民生需求、挽救民族危机为目标,这对摆脱旧文教制度的封建教化色彩,走向肯定民众主体性的近代教育有开拓意义。

三、结语

对郑观应的民本思想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从总体水平上来说其民本思想没有超越传统民本思想的君权改良主义的理论框架,具有改良和保守的总体特征。

传统民本思想是君本——民本的组合命题,不存在独立的民本主义,民本是君主政治的题内应有之义,同样,君主政治也离不开民本主义的修饰和补充,绝对的君主专制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也同样是不可想象和不可接受的,民本主义发挥着限制或软化专制政治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历代民本主义思想家对专制政治,特别是对专制暴政的揭露和批判。这种思想在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等人那里达到高峰,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唐甄曰凡帝王皆贼也,可以说对君主政治的合法性提出了空前的严峻挑战,有人就此评价说他们已经在迈向近代民主制的门槛前抬起了一只脚。二是在于民本思想肯定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君舟民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3]这些言论都是对民众在王朝兴替、社会治乱中的决定作用的论述。民本思想的这两方面含义是相辅相成的,但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前提。只有在对封建专制政治自发地做出比较充分的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较为深刻的人民性认识,专制批判的理论深度正代表了当时民本思想的总体水平。而郑观应的民本思想在专制批判这方面是做的不够的,由于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急迫性,使得郑观应的救世济民情怀急需借助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政府来推动,而且从思想认识水平上讲他一时也难以抛弃清政府,从不怀疑君主政治的天然合理性,所以他对人民地位的认识是围绕着对内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并借助清政府的权威对外抵御外侮这一目的服务的,其中内源自发的专制批判的意义很薄弱,所以他对君主和民众关系的定位还是传统的立君为民说,君主只要履行自己爱民养民的职责,他就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占据着人民的主人的地位,而民众的法定角色就是按照纲常礼教的规定履行忠顺君上的臣子义务。

郑观应民本思想的非专制意义实质上停留在上下一心、君民公利的层次,可以看到他在努力将西方制度剪裁得比较适合中国专制政治的国情,议院、选举等皆被附会曲解为君主政治的补充工具,成为君主政治范围内的概念。他的议院观可以说是典型的真理和谬误并存的概念,既看到了政出议院,限制绝对君权的现实,又强说它可防止篡逆,巩固君权集权,很显然没有触及西方议院制的实质,议院制背后所隐藏的人权、民权、自由、平等内在理念,议院与君主各自权利的分割和界定等问题郑观应都没有涉及。他对议院的认知只停留在直观化、表面化的层次,而且是将议院做出了传统

民本意义上的曲解,所以才他会把西方议院比附,甚至等同于中国民本政治中的“《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殷咨于有众”式的民情咨询传统,就这样在本来意义上分割君权的议院成了补充完善君权的民情民意咨询机构。这种对西方议院制度的误读正反映了他的民本论与西方民主论的真实差距所在。差距还不止于此,他的西方选举制如何落户中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日报行于中国也面临着现实上的重重阻力。照他的这些西化的主张行之中国,只怕避免不了不中不西、进退维谷的矛盾和尴尬。他的教民论虽然强调兴格致之学以开启民众智慧,满足民生需求,但离以培养独立自主的人为目标的近代教育还很远,他还是站在民众训导者的立场上,将民众看成是群氓,在他与群氓之间是有不可逾越的智识鸿沟的。从这些矛盾论述中可以窥见郑氏巩固一元化君权统治的终极追求,矛盾的解决只怕是在郑观应现有的民本思想框架内是完成不了,这其中反映了传统民本思想自身的局限,郑观应的民本论提示给我们的恐怕就是传统民本思想如何实现内在超越的深刻问题。总之,新词语、新事物的引进和使用并不能直接引导出民本观的突破或民主思想的出现,郑观应的民本思想还是典型的传统的君本——民本模式。

其次,郑观应的民本思想虽然以古今并用、中西杂糅为形式,但蕴涵了丰富的时代内容,有极强的时代性,体现了近代中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趋向,客观上有很高的理论开拓和升华的价值。

其一、郑观应引进议院等西方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主观目的是想把它限定在君主一元化政治的范围之内,但客观上却起到了瓦解君权的作用,从而使他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成为指向民主政治的风向标。这种指向在郑的民本思想当中也随处可见,如他在介绍议院制时,已经认识到了西方是“君民平权之政”,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民众权利的概念,民权意味着君民之间不仅是物质利益的分割,而且是权利职责的划分。而民“权”的有无可以说是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之间的根本区别,可惜的是郑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进一步论述。再

如对于西方选举制他不仅提出了选举应从下不从上的问题,而且对于基层选举的程序也做了较深入的展开介绍,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只可惜对于如何在中国展开这种制度他似乎还没有找到好办法。在宣传西方的日报时,他不仅看到了日报可以通达民情,更看到并欢迎日报开启民众智慧,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胆量的作用。这些认识虽然都只点到为止,但顺其发展下去无疑会引导中国政治逐步突破传统君本——民本政治的局限,甚至可能走向它的对立面——民主政治。近代历史的实践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其二、在文化教育方面,他的废科举、发展近代科技文化教育以开启民众智慧,改善民生的思想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近代化意义重大,中国教育近代化改革的脚步可以说就是萌发于此时。同时开启民众智慧的思想无疑包含有对民众固有智能的信任,这点与传统教民论一味站在先知先觉的立场上,用三纲五常化导民众,使民众安于贫弱的现状的思想有本质不同。郑观应虽然固守儒家礼教,但他更主要的是谈借助传统道德文化的力量来收揽人心,团结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应对近代中国的内外危机,这与顽固守旧分子盲目自大的文化取向相比也具有更开放的心态。它们都反映了郑观应的民众观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传统民本将民众工具化的层次,虽然还远没有达到还原民众主体价值、真正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发言的理论高度,但从他的民本思想演化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民权思想还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 [1]《尚书·五子之歌》.
- [2] 谢俊美.醒狮丛书·盛世危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3] 黄宗羲全集·明夷待访录·原臣[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马亮宽 岳广腾]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ories overview

The Realistically Diplomatic Ideas in Chinese Pre—Qin Period

(By PU Guo—liang)

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ese realistically diplomatic ideas were gradually brewing, sprouting, and growing in the course of territory annexation, nation conquest, and race fusion in Pre—Qin period. The ideas of military, force, power, strategy and tactics, etc,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plomatic ideas, exert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Chinese diplomatic ideas and theories thereafter.

Key words: Pre—Qin period; diplomatic relations; realism

The Min Ben Theory of Zheng Guanying

(By JIANG Chao—hui)

Abstract: The text mainly discusses the Min Ben thought of Zhang Guanying from the following sides: On the side of policy, he brought forward the question of expressing the public feelings, and constructed the responding system, by the way of carrying on the west's Chamber, election, and daily system. On the side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he suggested the edu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stitute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to build up the mob's brightness and protested the aggression of the west contracting culture with reforming Confucian ethic and moral order. Through the expounding of Zheng's Min Ben thought, we can see the age's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Min Ben theory and inherent localization.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Min Ben; Chamber.

Talk about Qian QianYi's Method Changing and Life Experience from Noting "Eight Poems of Qiu Xing"

(By ZHOU Sheng—jie, HAN Zhao—qiang)

Abstract: Qian QianYi had noted Du Fu's "Eight poems of Qiu Xing" for twice, one in "Du Du Xiao Jian" on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the other detailed in "Qian note Du Fu's poems" in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The twice notes laid different emphasis and the methods changed. From these we can find out that, on the era from Ming to Qing, Qian identified poems with history, expressing his loyalty to Ming dynasty and feeling pain in his words to note "Eight poems of Qiu Xing".

Key words: Qian QianYi; "Eight poems of Qiu Xing"; method; the life experience

Red°White°Black——on the Colors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Jane Eyre

(By DENG Hong—yi)

Abstract: Charlott Bronte in her Jane Eyre makes a smart use of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colors. She characterizes her characters by a rich use of red, white and black in character's conversati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ir surroundings. This makes the abstract characteristics concrete and rich, and causes the readers to imagine and think, so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the reader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Key words: Jane Eyre; characterization; red; white; black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on Hester's Personality Trait

(By GE Hong)

Abstract: Hawthorne portrays a rebellious woman Hester in his successful novel The Scarlet Letter, condemns the unfair treatment of women, praises her pursuit of self—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her selflessness and rebellious spirit, which reveal the author's belief that women should be liberated.

Key words: Hawthorne; Hester; feminist consciousness; rebellious spirit